

王金寿◎著

WANG JINSHOU

中国

古代文学传播概论

ZHONGGUO
GUDAI WENXUE
CHUANBO GAILUN

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出发，指出现代传播学原理论，在文献文本学、文学史研究之间构筑起一种系统化、关联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学体系。对文字缘何生产、如何生产、如何流通并保存等现象进行过程性研究描述，探索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尝试建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古代文学传播概论

ZHONGGUO GUDAI

WENXUE CHUANBO GAILUN

从发生学的学术立场出发，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在文献文本学、文学史研究之间构筑起一种系统化关联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学体系，对文学缘何生产、如何生产、如何流通并保存等现象进行过程性研究描述，探索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尝试建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

上架建议：文学传播

ISBN 978-7-5423-1843-5



9 787542 318435 >

定价：32.00 元

王金寿◎著
Wang Jinsou

中

国

古代文学传播概论

ZHONGGUO
GUDAI WENXUE
CHUANBO GAILUN

 甘肃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 上编 / 王金寿编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423-1843-5

I. 中… II. 王… III. 古典文学—大众传播—研究—中
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868 号

责任编辑: 吴洁琼 赵 鹏

封面设计: 马吉庆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

王金寿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70 千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1843-5 定价: 32.00 元

序

XU.....

程金城

文学传播伴随文学创作而来。换句话说，文学一经诞生就有传播。这是文学艺术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也是文学作为主要表达情感的精神产品的特性所规定的。假如没有传播，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功能意义就要大大折扣，其存在形态及其发展状况也是不可想象的。从远古神话时代到电子传媒时代，或口耳相传，或聚徒讲学，或游学演说，或谏诤酬唱，或传抄印刷，或电子媒介，传播对于文学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传播联系着文学的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影响着文学的存在样态与价值实现方式。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和客观存在的事实却是晚近才被人们认识的。随着接受美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才意识到文学的传播原是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环节。而将文学传播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更是近年来的事情。王金寿君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本拓荒之作，其原创意义不言而喻。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断代研究，有王兆鹏教授主持的《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还有其他几位研究者所作的理论探讨，他们都对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然而，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学术专著，据我

所知，目前则就是这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仅就付梓出版的第一编“上古文学传播”部分来看，本著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钩稽辨析，博考故实，沉潜史料，细致描述中国文学发轫期和上古时期传播的状况，并综合运用现代传播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文献版本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分类评述，多有发现，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初步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或者说研究体系。金寿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古典文学传播的线索和情况，但是，可以尝试从发生学的学术立场出发，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在文献文本学、文学史研究之间构筑起一种系统的、相互关联的古代文学传播学体系，对文学缘何生产、如何生产、流通并保存等现象进行过程性研究描述，探索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尝试建立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基于这种认识和努力指向，本著第一章，便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理论研究模式，涉及文学传播主体，文学传播动，文学传播媒介，文学传播模式和途径等几个方面。这个研究模式，涉及一般传播学理论的主要范畴，同时又有论者的创新之处。一般认为，传播是借说话、写作或形象，对观念、知识等的分享、传递、交换。简言之，传播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传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理论模式、传播内容、传播类型、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用著名的拉斯威尔的传播模式理论界定，传播涉及“谁”（传播者）、“说什么”（讯息）、“通过何种通道”（媒介）、“对谁”（受播者）和“达到何种效果”这样一些要素。金寿在本书理论框架中基本涉及这些方面，而其创新之处，是特别强调了“文学传播动因”这一因素。文学传播动因概念的引入，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还原历史精神的作用，也就是将文学传播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描述，揭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传播的社会和文化原因与个人目的，特别是文人的主观需求。这使我们看到一般文学史所不涉及的另外一些文学历史现象和人性因素。自然，建立一个研究体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研究者共同的努力，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雏形就会逐渐走向成熟。金寿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比较系统地分类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

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轨迹。即将出版的上编，对上古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如神话、诗经、楚辞、乐府诗、六经等的传播，进行深入的的研究，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作者以“大文学”观的视野来看文学的传播，研究对象涉及当时的主要文化现象乃至社会现象。比如，关于《诗经》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就涉及以礼仪乐舞形式传播，创办学馆、授徒传经，以及生活中的引诗赋诗、教科书传播等等途径。而对同一传播对象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方式的考证和描述也颇多启示。按照这种研究思路，作者将会奉献出十分可观、规模很大的整体成果。

本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鲜明的学理性。作者对文学传播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比如，提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传播，是以国家意志、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核心的；文学传播的特性表现在历时性、永恒性、经典型等方面；文学传播的重要方面是“美的形式”的传播等等。同时，论者围绕文学传播提出一系列学理问题，比如：原始文化的生产及传播主体是什么，最早执掌书写文字之职的人是谁？比如对周秦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主体——史掾的探讨，再比如提出魏晋时期文学传播和文体的区别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建立在作者对文学传播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学术思考之上。在文学传播主体方面，论者从文学的发生、传播主体的身份、不同时期的主体的类型等方面进行论述，分梳得当，评说审慎，多有启发。由此使我们看到，从共时态来看，传播决定文学影响力的深广度，从历时态来看，传播关系文学传承的向度。

金寿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之余，选定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深入钻研，厚积薄发，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期待《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后几编的早日问世。

当今的文学研究，主要是作家作品的研究，以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为核心，系统观照作家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审美关系。而作家作品又是以纸质文本为载体，学术界非常重视文本的真实性，考订其版本和有关作家生平资料的真伪，企图比较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创作情况，确证其文学价值。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不再以纸质文本为唯一的物质载体，作家及其作品也不再以编辑、出版者的意志决定其命运而能以纸质文本之外的声音、图像、电子文本或数字形式进行多元化广泛传播，并且打破了传统媒介时空限制，以非常迅速、便捷的方式在全球传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关注文学的传播问题了。换言之，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在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必须把原来视之为边缘学科的编辑、出版、网络、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传播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去思考古代文学的传播，和未来文学还将以何种方式传播的问题，以此构建文学传播的理论不仅必要而且显得尤为紧迫。

传播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一门以研究人类思想文化传播活动、传播方法、传播技巧及传播理论为对象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引入我国，九十年代应用在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领域。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专业研究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报刊等大众传媒的一门基础性课程。文学传播应该是传播学的分支之一，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和理论视野，建构起文学传播理论体系的文学传播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我们今天有非常明确的文学概念，文体学分类的概念，有很明确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定义，以及相应的出版、发行、传播的行业机构和管理机构。同时，还有与之相生相存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学术事业和各种文化学术机构。文学作品从创作到出版发行的渠道、传播流程，已为业界熟知，并且是自觉遵循的程序。即某人创作了某种文学作品，交与某刊物、某出版社审定，以书刊、电子文本等物质形式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传播，人们通过阅读、欣赏、批评等审美过程，接受了他们的文学思想，受到了美的情操的熏陶，提高了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实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同时，也确立了某诗人、某小说家、散文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尊重。这些作家中，有的可能是专业作家，有的也许是从事于其他职业的业余作家。包括了各民族的所有成员，无论妇女老幼。由于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更多地关注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价值、地位价值，无意间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本体，滋长了文学功利性或趋利倾向。又以创作风格形成的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团体，（诸如文学艺术家研究会、作家协会等）和各种级别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奖励机制和专门机构，（如省级、国家级及国际性的各级各类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激励着文学的创作，加速着文学传播的速度，扩充着文学传播范围。优秀的文学作品已经不仅属于哪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文学方面就有了世界性的最高级别的文学奖，就是大家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每个文学家毕生奋斗的梦想。

由于文学的传播，又产生了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家、研究文学现象及构建某种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各种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研究的学术事业，诞生了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出版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学术成果的专门出版机构。文学创作繁荣着文化传播的出版事业，促进着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推动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加剧着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纵深发展。这就是今天文学传播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传播媒介、传播动因以及传播方式、传播途径等。

文学传播是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自觉行为，是人类精神思想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人类于文学的精神需求正如对食品、水、空气等物质需求一样的自然而然、一样的不可或缺。因此，今天的人们，开始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文学传播的全过程，有了明确的版权意识，自觉维护文学作品的原创权。

因此，文学传播在今天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似乎是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问题。

但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念尚未明确，有关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机构、传播媒体尚未形成或成熟的古代，文学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呢？文学作品的“生产者”——作家，在文学尚未自觉的最初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如何？为什么要“生产”作品？生产的作品的种类、质量、数量以及“市场供求关系”如何？“产品”的销售（传播）方式、种类、渠道、媒介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形？作品受众（或购买者）为什么要接受（或购买）？接受的渠道、方式、媒介又是什么？作品销售（传播）的效益（果）如何……好像未必是人人能清楚明白的事了。

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史研究，涉及作品“生产者”研究（包括其生平、思想、创作过程、创作思想等研究）、产品研究（或曰作品的文学性鉴赏、鉴赏理论、方法等的历史进程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史，涉及从接受者方面建构接受者的话语系统、价值系统；版本学，涉及“产品”出版情况的研究，包括如何出版、产品的真伪、时间、出版地、出版社等情况的研究。以上各类研究，其理论基础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学的价值系统，研究的思维方式就是以此理论去对应古代的文学现象。如果符合者就称之为文学作品、文学作家，反之，即排除于文学范畴之外。尽管它们相互借鉴相互依存，但是又各自建立其理论体系和写作标准，显然缺乏文学从生产者、生产过程到“产品”的接受、批评等传播全过程的系统化关联的理论描述和话语系统。

换言之，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古典文学作品，很难说都是某个时代某个作家的原创作品。如果对古代某时代某作家的文学作品从生产到流传等传播的全过程缺乏明晰系统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始终对今天的古典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现象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等研究中的某些结论、存在的问题等等，有理由从根本上加以质疑。从另一方面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是运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念及话语体系来审视和研究古代文学的，而这些理论大多是借用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学艺术研究来说就多多少少存在削足适履的嫌疑和弊端。实际上，我们自古就有丰富的自成系统的本民族的文学艺术批评的理论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本民族的审美视野，而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恰恰存有“失语症”的现象。

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已经二十年了，这样的困惑和质疑也就越来越强烈。因为，我们大多数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人都没有可能亲眼见到某个作家的作品的原貌，即使见到了，也只能是极少的一部分或经过后人整理、加工过的东西。

众所周知，古代印刷术出现后，首先印制的是佛教的经卷和儒家的经籍，文人自己的文学作品的被印刷，那应该是北宋末以后的事了。在文学文本传播的物质材料、技术手段等物质基础比较贫乏的时代，印刷的成本的确太昂贵了，大量的文人的文学作品只能是靠文人自己或朋友或后学们或爱好者的抄写传抄了。而传抄的过程难免错抄、误抄等，抄写的数量一定是非常有限，并且也只能是在他们那种很狭小的范围和圈子里传播。更有甚者，在传抄的过程中也难免由传抄者进行符合自己时代价值观的适当加工和再创作。时间越古的作品，问题应该就越多越严重。出现了某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该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伪书。例如《神农本草经》相传为上古时期神农作，《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作，《列子》相传为先秦列御寇作，却都是伪书。伪书的出现，有有意为之者，也有无意为之者。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要》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道的需要。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秦汉以来的学风，形成了一种贵古贱今的普遍倾向，认为古代的东西可信，

古代的东西价值大。于是，在著书立说中托古以传道，或借他人之名以传其书。如在先秦时期，儒家托之周公，农家托之神农，道家托之黄帝，《汉书·艺文志》中多有揭示。兵家之书《十六策》《将苑》《心书》，均题诸葛亮，《四库提要》指出“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

第二，为获得金钱利益而伪造。《北史·刘炫传》记载：“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四库提要》记载：“唐代选举之制，算学《九章》《五曹》之外，兼习此书。此必当时购求古算，好事者因托为之，而嫁名于岳耳。”这种以牟利为目的的造伪现象在后来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尤多。如《筠轩清秘录》，旧题董其昌撰，实际上是把张应文的《清秘藏》二卷析为三卷，又伪撰陈继儒的序，以取信于人。《四库提要》指出：“书贾以其昌名重，故伪造继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

第三，为了名垂青史，不择手段，窃取他人成果。如《化书》，旧名《齐丘子》，题南唐宋齐丘撰，《四库提要》引宋代陈景元说：“谭峭景升，在终南著《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见齐丘有道骨，因以授之……齐丘遂夺为己有而序之。”

第四，为了求一时之胜，伪造证据。或为了打击政敌，故意制造伪书。如三国时魏国学者王肃为了求一时之胜，伪窜《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二十一卷，肃自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当时博士马昭曾经说：“《家语》王肃增加，非郑玄所见，肃私定以难郑玄。”（《礼记·乐记》疏引）宋代王柏《家语考》则说：“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之也。”再如，《碧云騞》，题梅尧臣撰，实为魏泰伪造。《四库提要·临汉隐居诗话》：“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騞》，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邵氏闻见后录》引王铎《跋范仲尹墓志》云：“范仲淹与欧阳修、梅尧臣立朝同心”，托名梅尧臣攻击文彦博，

其用心不言自明。

第五，由于政治原因，一些书不能以真正作者的名义传播，不得不改题作者。例如《子华子》，旧题先秦晋国程本撰，《四库提要》认为：“殆能文之士发愤著书，托其名于古人者。观其篇末自叙世系，以程出于赵，眷眷不忘其宗，属其子勿以二心以事主，则明寓宋姓。其殆熙宁、绍圣之间宗子之忤时不仕者乎？”可见，《子华子》之所以托名以行，在于真正的作者是一位“忤时”者。自举其名，该书是得不到传播的，甚至还会带来其他麻烦。再如《全唐诗话》，旧题宋尤袤撰，《四库提要》说：“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窃据旧文（按：旧文，指计有功《唐诗纪事》），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

第六，有些作品虽然能够被普通读者接受，但为正统观念所不容。为了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假托其名。例如描写男女爱情甚至男女性爱的作品，被认为有伤风化，只能用假姓名。如《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民生活的作品，事涉淫秽，作者不愿直署其名，而是自称“兰陵笑笑生”，使得几百年来关于其作者争论不休。当然这不属于伪书。

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文学”的作品，如，早期的词、散曲、小说、戏曲等作品，由于当时的价值观决定，一直被视为“小道末流”，不为正统文学所接纳，以传抄的形式在民间传播，遭到了“肆意”的篡改和“践踏”，以致我们今天给予很高评价的作品又恰恰是后人的“伪作”。比如，《三国演义》是清康熙朝毛伦、毛宗冈父子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删改、加工的，但比《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性更强，而今天被广泛传播的百二十回的程乙本《红楼梦》又显然不是曹雪芹甲戌手稿本的原貌。何止乎此，连儒家奉为圭臬的“六经”也有了同样遭遇。西汉初年，是上古文献得到系统发现整理的时期，也是制造伪书的时期。大家知道，汉儒以秦文写六经，引起了古今文派的斗争。小而言之，由于当时对古文献转译的缘故，使得古字错认了，对解经是有害处的，如“文王”之误为“宁王”等。当时“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更有甚者，汉朝人以自己的思想解经，自然制造了一些假书伪书。如三家《诗》是汉初的写定本，而三家诗文已与《论语》所引不同；《论语》

中有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类似讖纬的话，显然在《毛诗》中是没有的；大、小《戴记》中大部分是汉儒做作的；《孝经》中所说的天子诸侯都是汉家的天子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战国间的诸侯。这些问题后文要作详细的论述。傅斯年先生说得好，他说：“古代文学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难整理最难用的，因为材料的真伪很难断定，大多是些聚讼的问题。原来中国人之好做假书——就是制造假材料——是历代不断的，若大家认为最多出产假书的时期，由汉到今约四个：一、西汉末年，即所谓古文学；二、魏晋间；三、北宋的盛时，政府收书；四、明朝晚年，学士又有一番托古的习尚。”（《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诗经讲义稿》第139页）我曾经请教过很多学者诸如是否见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亲笔书写的诗集原貌等非常幼稚的问题，但是，回答都是一致的——“没有”。那么，这些人的作品是如何生产的，以及为什么要生产、要传播等等问题的解答，显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不能很好地予以解决的，只有建立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切入，进行系统研究，解决作家的创作动因、文学传播以及接受的动因等问题，方能廓清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中的一些“器质性”缺陷。

我的年轻的学生也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古代的作家和我们今天的作家一样吗？他们那个时代写诗的稿费是不是很多？当时有没有类似《诗刊》一类的出版编辑机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发表的？谁给他们稿酬？他们作为作家的社会地位如何？如果没有稿酬及待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写呢？如果有丰厚的稿酬，再加上他们当官的薪水，不会像文学史里说的那样生活窘迫呀？他们为什么要创作文学作品？创作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是由谁来管理的……

版本学、辨伪考证学和古籍整理研究在考订作家作品真伪方面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今天我们似乎不应该对此怀疑，但是，我们仍然在文学史中得不到古典文学如何传播的更为明确、清晰、肯定的知识，仍然心里不甚踏实。虽然文学史是建立在版本学对文献版本的搜集、整理、考订成果基础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梳理解构，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但是我们仍无法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古典文学传播的线索和情况。因此，从发生学的学术立场出

发，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理论视野，在文献版本学和文学史研究之间能否构建起一种系统化关联的古代文学传播学，对文学文本缘何生产、如何生产、流通并保存等现象进行过程性研究描述，探索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尝试建立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应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以此为动机，本书试图对上古文学的传播情况以蠡测的形式，通过对早期人类思想文化的精神成果的传播描述，对《诗经》、“六经”、楚辞等文学传播的研究，企图初步建立起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架构；通过对中古时代文学传播“点”的研究和过程的描述，进一步印证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通过对小说、戏曲等文学传播的描述，进一步研究文学传播方面的有趣现象。

本书涉及人类文化学、古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出版史等方面的内容，由于文献资料及个人学力的种种限制，大有自不量力之感。但是，我仍鼓足勇气“抛砖”，旨在能引出“真玉”，予愿足矣。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001
第一章 文学生产、传播的理论架构	001
第一节 文学传播主体	003
第二节 文学传播动因	023
第三节 文学传播媒介	037
第四节 文学传播方式、途径	069
第二章 《诗经》的传播	075
第一节 《诗经》的生产概说	077
第二节 《诗经》的传播动因	087
第三节 《诗经》的传播媒介	099
第四节 《诗经》的传播方式、途径	106
第三章 楚辞的传播	121
第一节 楚辞的生产概说	123
第二节 楚辞的传播动因	139
第三节 楚辞的传播媒介	147
第四节 楚辞的传播方式、途径	153

第五节 辞赋的传播	162
第四章 乐府诗的传播	181
第一节 乐府诗的生产概说	183
第二节 汉乐府歌诗的传播	199
第五章 “六经”的传播	209
第一节 “六经”的生产	211
第二节 “六经”的传播动因	248
第三节 “六经”的传播媒介	253
第四节 “六经”的传播方式、途径	258
参考文献	266